

“保卫80后婚姻行动”如何见效？

◆ 刘汶蓉

聚焦于离婚环节的社会工作和硬性制度约束，真的能为80后带来幸福的婚姻吗？有效的社会支持机制必须建立在对问题的正确认识之上。如何理性地看待80后离婚率走高这一社会现象，笔者以为必须厘清以下几点：

首先，80后离婚率走高是一个自然现象。中国离婚率整体上升，80后群体中的离婚率自然也会上升，这是水涨船高的效应。

其次，80后离婚者并不代表80后的群体特征。2006年一项调查表明，上海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1.1岁，在当前城市青年婚龄普遍推迟的时代，能在27岁之前离婚的人必定是少数。与此相对应，30岁还未能找到结婚对象的城市青年大有人在，80后甚至70后人的择偶问题、结婚问题似乎更严峻。

再说，80后离婚并非出于草率和冲动。掩盖在“个性不和”的无过错离婚下的实质，其实是双方无法继续维持一种和睦相处、相爱相亲的关系。这是一个能力欠缺的问题，而非感情冲动和盲目草率。没有人

近来80后的婚姻问题备受瞩目，围绕他们的闪婚、闪离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。以妇联为代表的社会组织、政府机构也都积极行动，寻找应对出路。上海市浦东新区成立了老娘舅式的“离婚劝解行动小组”，广州市妇联开展建立试离婚制度的讨论。其目的都是阻止“有性格弱点的独生子女们盲目离婚”，“保卫婚姻的神圣性”、“保卫家庭的稳定”。

会主观上把婚姻当儿戏，只是不知道如何做才能避免儿戏的结果。对于充满理想主义的80后来说，离婚是其走投无路的痛苦选择。

其实，80后闪离是社会教育的缺位。爱是人的本能，但相爱和维持相爱的关系则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能力。在多子女时代成长的人，从小就在与兄弟姐妹的长期相处中掌握相处技巧，学习宽容、妥协和忍让，并逐渐内化为本能。而80后的独生子女却被独生子女政策剥夺了这种社会化的环境，更为遗憾的是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没有为他们设立此类培

训教育的机构，也没在学校教育中教授相应的知识。

笔者认为80后闪离更是家庭内外多重压力交织的恶果。一个成熟的婚姻，需要夫妻双方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行动能力。但检视我们的社会，按资排辈的薪资制度、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物价，30岁前不依赖父母就能拥有体面生活的年轻人寥寥无几，建立一个家庭更是不易！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于是过了二十几岁的80后独生子女，往往在父母的帮助下成家生子。成家后也依然习惯性地依赖父母，陷入家庭界限不清的局

面，这种毫无自主能力的小家庭，承受不起风雨也就不足为奇。

从另外的角度说，选择离婚是80后实现自我掌控命运的一部分。对民主、自由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，是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，也是现代独立人格的必须。80后从一出生就因独生子女而活在社会大众监视的眼光里，长期以来他们受到的关爱和束缚太多，而自我负责的机会却太少。如今他们在代际上已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，制度设计者不能依然把他们当孩子看，以“为他们好”为由，想当然地设立政策规则去主宰他们的命运。

建立符合现代价值文明的幸福生活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挽救婚姻，更需要挽救幸福。和其他人群一样，80后的婚姻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帮助，需要专业的咨询机构在婚前、初婚、孕期、育儿等各个阶段提供帮助和指导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需要赋权，需要信任和鼓励，进行自我抉择，需要学习婚姻家庭科学知识、掌握人际沟通技巧的社会文化环境，以获得经营幸福生活的能力。

| 三 | 言 | 两 | 拍 |

“补贴”考虑要周详

最近各地加大对高校学生食堂的补贴力度，教育部已派出3个检查组分赴广州、南京、天津督促指导。上海56万大学生每日食堂三餐的人均费用，也将维持在8.5元至9元之间。

到底是补贴食堂还是直补学生？如果直补学生，如何把握困难学生与普通学生的补贴比例，都得考虑周详。弄不好的话，仿佛一瓢水不是进入渴者口中，而是误进谷仓，让稻谷发了芽。像市教委组织400余吨猪肉等主副食品供应高校，这就是特殊时期的政府作为；为避免学生补贴被“稀释”，复

旦大学规定外来“蹭饭”者要收20%的搭伙费，这更是实实在在的做法。

徐迅雷

除“心墙”更重要

为防止上访群众堵门，湖北崇阳县委曾在办公楼的每一层都设铁门，群众找县领导得先闯“四道门”。崇阳县委书记周亨华带头拆了保护门，还推倒大院围墙，建大型市民休闲广场。

拆除围墙，是一种姿态。但若在表面上倾听民声，而在具体的执政行为中，却拒民于千里之外，就不是真正亲民的官员和政府。砸围墙容易，要去“心墙”，还看执政中的具体做法。

毛建国

不是完美开局

前两天，中国女足与丹麦女足的比赛中国队赢。第二天，读报，有媒体打出标题“完美开局”；有媒体头版头条头号黑标“惊魂2分钟惊艳开门红”；但有位小学四年级的小记者，却写了篇“赢得胆战心惊”的文章。

赛前，就有不少媒体说中国女足要“割麦”（丹麦），听起来不怎么舒服。难道中国女足真像一把锋利的镰刀？非也！整场比赛丝毫不见“割麦”般的轻松，比分也没有像“割麦”般哗哗落地，而是在最后2分钟，由宋晓丽攻入致胜一球，艰难地以3比2胜出。媒体是玩文字的，请问这也叫“完美开局”吗？再

说了，就是踢个10比0，也有不完美的地方。

钱甫生

规范城管言行好

今年8月，湖南省发文规范城管执法人员的言行。前几天长沙小贩李民碰到城管人员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，执法人员不再像以前那样掀翻他的摊子，而是劝他别在马路上随便摆摊。

湖南省出台的规范性文件，开列了许多“严禁”的行为，还制定了一套礼貌用语，明确规定城管执法的程序和文明执法的义务。这对保证普通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，提升城管形象，缓和城管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，有示范意义。

叶雷

| 来 | 函 | 摘 | 登 |

民本至上：企业利润保障大众

◆ 陈一舟

国有企业利润独享的时代行将终结。2008年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全面展开，今年将在部分企业试点。国务院9月13日发文规定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除了用于国有经济布局 and 结构调整，支付国企改革成本等之外，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支出。

国企产权属于公共产权，归全民所有。国企利润由国家分红天经地义。如果说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，国家向国企停止征收红利，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，那么在当前的语境下，国家向国企提取红利，时机已经成熟。据财政部研究机构估算，2007年中央企业的收益将超过8000亿元，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利润，规模将超过1.2万亿元。

国企红利纳入国家财政的二次分配，必然会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水平，缩小贫富差距、促进社会公正。而制度性的“分红”，会“挑动”国企反哺社会的责任神经，促动企业伦理从“利益独享”的错位轨道，向理性的社会责任回归。因此，向国

企征收红利对于国家、社会以及国企本身，都有百益而无一害。

舆情曾经担忧，国企上缴的红利会作为一种“扶持资金”再次返还给国企，而普通百姓基本上无缘于分红。而国务院“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”的明确规定，打消了大众的顾虑。

这是政府重视民意的结果。许多迹象表明，国家正在从经济、行政、司法等方方面面着手构建“民本至上”的管理要件，流露出政府尊重民意、重点保护民生利益的可贵姿态，体现出善治并乐于接受监督的强烈意愿。在文明民主的浪潮中，不公正、不合理、不和谐的经济与政治的诸多体制弊端，正在逐渐淡出公共视野，成为历史。而作为重大的经济变革标志之一，国有企业利润独享的时代宣告终结，昭示着政府善治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。国企利润“泽被苍生”，是社会之福。



遏制通胀“起飞”

从美官员受贿 2 万 获刑廿年说起

◆ 逸中

日前，大洋彼岸的美国传出了官员贪腐丑闻。FBI(美国联邦调查局)凌晨出动，从床上将那些贪官们一一捉拿归案，一口气捉了11名官员，包括2名州议员、2名市长、3名市政会成员，以及几名学校董事会成员。

可接下来的事听起来好像有点“怪”：这些官员受贿的金额从1500至17500美元不等，交纳的保证金每人高达20万美元；并且如

果罪名成立的话，每人将面临20年联邦监狱的监禁！

15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1250元，也就是说贿金不足2万，也可能获刑20年，还须交20万保证金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

有好事者将近年来国内被抓的贪官按贪污受贿金额数排了个“50强”榜单。此“50强”贪污受贿金额总共为人民币70.414亿元，人均1.40828亿元，约折合美元

1877.7万元。那几个从床上被抓起来的美国贪官与他们相比，连个零头也不及！但若从所受惩处相比，美国人则要严厉得多！

按现行中国《刑法》，受贿罪以受贿金额不等和情节轻重共分四等，其中以受贿金额5千元、5万元、10万元为三条基本界线。据此那些美国贪官当在受贿5千元上下量刑，即使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，也只是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轻者则

“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予以行政处分”，而不用刑事处罚。虽然两国有许多差异，但显而易见美国对贪官的惩处，远远比中国严厉。

其实国内巨贪“50强”，无不是从贪国千元、万元小利失足的。贪小利无大风险，他们的贪欲便会膨胀，等贪欲之手想缩时已来不及了。假如我们也能像美国FBI那样，即使只是区区千元贪渎，照样漏夜抓之，并用手脚镣伺候、20年刑期恭候，那些个贪官还敢或还能走到那种地步吗？

在我家居住的周边，约有五六个居委会，经常通过拉线广播传达有关通知，这当然是桩好事情。但发言人往往习惯于使用浓重的上海方言，满耳朵都是“阿拉”和“依”，难怪乎外来人员听不懂，心生反感。

上海的发展一日千里，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。尤其是2010年，上海将举办世博会，五湖四海、世界各地的宾朋都将来到上海，这就需要我们在全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，推广普通话，加强人际沟通与交流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隔阂和障碍。

有这样两个关于方言的小故事。一个是“孟良气走丹阳”，说的是孟良因为听不懂当地方言，一气之下忿忿地离开了丹阳。还有一个故事，说清朝雍正帝有次品尝潮州进贡来的荔枝，因为不知道如何吃，一口咬碎了荔枝核，顿时龙颜大怒，责骂来人，却不知人家早已告知其中有人核，只是他听不懂方言罢了。可见，方言有时候欺客，有时候误事，还是推行普通话最好。

上海在推广普通话方面，这几年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；在公共场所、服务行业，已经基本上推广开了。但是，市民相互间讲普通话的氛围，还不浓，尤其是在社区里。现在许多社区都是新旧上海人混住，要广播什么重要的事，理应请会讲普通话的人来，这也不费什么事。不仅如此，居委会作为政府伸向社区的“触角”，理应在社区推行普通话，居民们平日里直接接触较多，这恰恰是练习普通话的最好的机会。

喜见农民工子女学校“转正”

◆ 陈才

一开学，浦东新区大别山小学三年级的辉辉(化名)非常高兴，他回家告诉父母，教室的墙壁粉刷一新了！从新学年开始，这所学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，从原有的“简易办学点”转变为“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”，成为上海市首批“转正”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之一，在校生将同公办学校的学生一样，享受免学杂费的待遇。

近年来，关于农民工子女学校存废的讨论一直存在。不可否认，在不少大城市公办学校和民办打工子弟校的生源基本是一半对一半，公办学校没有能力一下子接收这么多民工子女。农民工子女学校给流动儿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，在很多方面适应了打工者的实际需要，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。

但是，许多农民工子女学校没有教育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，教学质量不高，办学条件、校园设施也极其简单，有些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因此，取缔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呼声此起彼伏。但除了简单取缔之外，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途径和方法？上海的“转正”之举，无疑为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上学问题，提供了良好的范本。

2007年，上海市教委将改善农民工子女学校办学条件列入年度重点工作，对办学条件较好、生源较集中的“简易办学点”，转为“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”，纳入教育统一管理。据了解，一旦转为“民办”，每名学生每学期可享受政府1900元的补贴，学生缴纳学费从原来每学期600多元减少到330元——学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。

一种是简单粗暴地加以取缔，一种是创造条件让其良性发展，不同的做法，折射出了不同的执政理念，也测出了城市管理者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、科学行政。

有必要在社区推广普通话

◆ 王惜时